

第三十四辑

四川文史资料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会编



四川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十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(三十四辑)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灌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6.75 字数 153 千
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二次印刷
印数1,801—5,800册

书号: 11118·150

定价: 1.15 元

目 录

爱国诗人吴芳吉事略……………施幼贻 (1)

附录: 读《爱国诗人吴芳吉事略》书怀……………邓少琴 (14)

张大千年谱……………李永翘 (16)

爱国至忱以死勤事——

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……………陶亮生 (46)

回忆我的母校——成都树德中学……………刘玉珊 (55)

吴照华与树德中学……………廖清华 (64)

孙震与树德中学……………林振川 (69)

树德中学董事会和学校经费

来源及资助学生情况……………雁 秋 (72)

在四川从事军政工作十年的回忆

……………熊克武生前口述 熊达成整理 (76)

记胡景伊任四川都督时期的活动

……………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政治军事史组 (97)

我所知道的胡景伊……………吴光骏 (109)

和源实业公司与刘航琛……………刘伊凡 衷玉麟 (116)

四大家族对四川蚕丝业的控制与掠夺……………李 楠 (138)

合川桑蚕丝业的发展……………杨仁辅 (148)

重庆的轿行……………陈宗树 (160)

川北土皇帝——黄清沅……………梓潼县政协文史组 (179)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对《邓秀廷对彝族的血腥统治》一文的校补	
.....	李仕安 (194)
对《国民党军队屠杀大凉山彝族的回忆》	
一文的校补	李仕安 (200)
对《靖边部改组及其对布拖彝人的屠杀》	
一文的校补	李仕安 (208)

爱国诗人吴芳吉事略

施 幼 贻

吴芳吉是我国“五四”运动前后一位很有才华，颇有影响的爱国诗人，他创作的诗篇能反映现实生活，揭露社会矛盾，表达人民意愿，充满爱国忧民的激情；他勇于探索，在诗歌形式上大胆创新；他的诗语言清新，生动易懂，易为人接受，代表作《婉容词》、《巴人歌》曾蜚声诗坛，众人争诵。

吴芳吉，字碧柳，号白屋。籍贯四川江津。一八九六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重庆。幼极聪颖，三岁就能背诵母亲选授的《诗经》中的一些篇章。父名传姜，字安定，一九〇三年，因经商亏折负债，被控入狱，家境十分困窘。次年（一九〇四年），吴母刘淑贤携八岁的芳吉返故里——江津德感坝，依伯叔为生。一九〇六年，吴芳吉十岁，随母迁居白沙镇。吴母应当地女子小学之聘作教师，家境稍宽，乃送吴芳吉入白沙镇外八里之黑石山聚奎小学初小插班，于一九一〇年毕业。

吴芳吉十二岁时，得学校会计龚茂如资助，步行至重庆狱中探视父亲，自作状词为父辩诬。词情恳切，父因以获释，与芳吉同返白沙镇。

因吴芳吉生于重庆杨柳街碧柳巷，聚奎小学教师刁建勋便以“碧柳”为芳吉字。从此，吴芳吉常自称“碧柳”，写诗作文则署名“白屋吴生”。他解释说：“白屋者，某在白沙镇所居，先

考所命名也。后家长沙，及返住德感坝，皆名白屋。兹以称诗，不敢忘亲意也。”（见《白屋吴生诗稿·编辑大意》）。

吴母十分关心芳吉的学习，孩子课余回家，她总要详询其学习情况，并常为芳吉讲授汉、魏、唐古典诗文。吴芳吉也把陶潜，谢朓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和王维的诗读得烂熟。吴母还常给芳吉讲述历代兴亡之事，使他从小就受到关心民族命运的思想熏陶，同时打下扎实的文学功底。一九〇九年，吴芳吉十三岁，因感于清廷腐败无能，备受列强压迫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心里极为愤懑，他在课堂上写了一篇题为《读清季外交失败史书后》的文章，痛陈时弊，语多精辟，爱国激情溢于字里行间。文长一千七百字，他以两小时一气呵成，业师萧湘（绮笙）读后，大为赞赏。一时，文章在江津县中小学中为人争相传诵，誉吴为“神童”。

萧湘系四川荣县艾叶滩人，早年留学日本，肄业于东京宏文师范。适中山先生去东京宣传革命，萧湘参加了同盟会。后与同盟会员谢奉琦（伟颀）回国，在家乡教学，宣传革命。不久，谢奉琦为清政府逮捕，萧湘率眷避难江津，任聚奎小学国文教员（时为一九〇七年）。他对吴芳吉非常器重，对吴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。吴芳吉后来能成为爱国诗人，是跟他从小就受到母亲和老师的良好教育分不开的。

一九一〇年，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“庚子赔款”在北京清华园设立留美预备学校，诏各省提学使选送优秀学童入学。吴芳吉以优异成绩被选送成都参加预选，被录取。次年，他又在去北京会考前发愤补习英语，又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会考。当时正值辛亥革命斗争高潮，时局动荡，学校开学无期，他只好返回四川。八月，四川爆发“保路”风潮。十月，武昌起义成功，推翻了清

王朝。革命风暴使吴芳吉大受鼓舞，他虽未直接投身革命斗争，但他对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景仰的、拥护的，对袁世凯窃国僭位以及后来发生的军阀混战是切齿痛恨的，这在吴芳吉于一九一六年写的《思故国行》等诗中有明显的反映。

一九一二年，吴芳吉再去北京，入清华肄业，结识了吴宓（雨僧）、刘朴（柏荣），日夕相聚，评诗论文，切磋砥砺，成为莫逆之交；尤与吴宓友善，情同手足。吴宓常在吴芳吉最困难时给予支持和帮助，且常常是吴芳吉诗作的第一个读者。在读书治学上，吴芳吉得益于吴宓之处甚多。吴宓在给吴芳吉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足下志气雄豪，文笔健举，以此学诗，诗即不工，亦已完纯无病，况其工乎？细绎足下诗，于古人则近陆放翁，放翁遭际身世，足下已知之详。至其作诗之日，多居蜀中，故其集号《剑南诗稿》。足下亦生长渝城，相如子云，雄浑绮丽，蜀水蜀山，天久付诗人受用矣。愿更勉之。”“尊稿反复诵读，多已成诵。其情哀，其节壮，其词丽以则，其意深而远，知足下迹来所进日深。险阻艰难，所以磨炼英雄，亦以成就诗人。世态物情，虽言之可愤可恨，然拈来手中，皆是诗人良好材料，于足下诗观之益信。”吴宓还在信中反复勉励吴芳吉多多写作，他说：“足下之诗，颇多忠爱之言，而尤重沧桑之感……昔赵瓯北有诗云：‘国家不幸诗人幸，说到沧桑句便工。’嗟乎，碧柳！吾辈生今之世，即不欲以诗人自显，又焉能负此时势乎？况足下弱冠之年，天涯奔波，风尘戎马，万里为家。当其人世之初，壮心始违，忧愁交至，可道可歌，无往不然。凡是诸种，佛法所谓因缘，既已定为因缘。虽欲不倾泻吐纳于诗之中，岂可得哉！岂可得哉！”（见《白屋吴生诗稿·通信》）

吴宓的信给吴芳吉很大启发，从此，他“遂发愿为诗，凡吾

有感而弗逮者，一一纳之诗中”。

此信写于一九一三年冬月十日，时吴芳吉已因代表同学抗议清华外籍教师侮辱中国学生何鲁、黄秉礼被学校开除（被开除的还有全部学生代表十余人），后经教育总长范源濂（静生）斡旋，被开除者各具一纸悔过书，即可复学，吴芳吉却以“无过可悔”而断然拒绝。他这种不惧官府和洋人，挺身维护民族尊严的行为，是他爱国思想的反映，是值得称道的。而他这一正义举动却付出了巨大代价：留美之事自然成为泡影，而当时清华的教师阵容，用吴芳吉的一句诗说，是“当代聚耆英”，诸如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等名家，均在清华讲学，吴芳吉被开除离校，就失去了向这些名家学习的良机，但为了民族尊严，他也不能顾及了。

吴芳吉离开清华，寄宿于北京的一位族人家中，遭受刻薄冷遇，役使如童仆，严寒冬夜，宿于走廊角上，常被冻得彻夜不眠，健康大损。后幸得四川同乡云阳邬镜苍的资助，始得动身返川。那时正值讨袁军兴，道路阻塞，耽延时日太多，到宜昌时川资已尽，只得沿江步行，做一些劳力糊口，多数是为木船拉纤，有时甚至乞讨度日。行程三千余里，历时五个多月始抵家。后即以亲身感受写成纪行诗七十首寄吴宓，上面说到的吴宓的那封信，就是读了这七十首诗的复函，故有“险阻艰难，所以磨炼英雄，亦以成就诗人”的句子。这一年，吴芳吉十七岁。

一九一四年，吴芳吉与何树坤结婚。何系江津蓑衣滩人，曾就读新本女校，甚喜文学。婚后，吴芳吉居家，潜心读书。时业师萧湘任嘉州（今四川乐山）中学校长，吴芳吉应邀任该校英文教员，结识同事谷醒华、赵鹤琴，成为好友。

一九一五年春，寒假届满，正拟返校，传闻上川南有陈步三

之变，逼近嘉定（乐山），嘉州中学恐难开学，吴芳吉欲行又止。又闻上海有对日兴师之准备，吴芳吉满怀报国之情，与挚友邓少琴同往上海，将以从军，但不得端倪，乃坐困上海。经吴宓介绍，入“右文社”校刊《章氏丛书》，月薪十二元，以六元寄家，生活甚是清苦。但他公余却手不释卷，读了许多中外古今名著，曾有诗云：“呜呼人生如朝露，百年行乐奚足数？安得读遍古今书，行遍天下路，受遍人间苦，使我猛觉悟！”

秋八月，因与右文社当事人意见不合，遂辞去，流落上海，与邓少琴相依，“日食粥一碗，垂毙”。吴宓在北京获悉，汇款接济。袁世凯称帝后，为镇压反对势力，派曹錕、张敬尧等率兵入川，祸及乡里。吴芳吉闻讯，和邓少琴兼程返回江津。翌年（一九一六年）三月三日，行至四川忠州（忠县），沿河上下无一船只，只有他俩所乘“把窝”小船，溯江而上，被北军截获，说他们是“侦探”，几被杀。经邓少琴用北方话再三耐心解释，始得放行。脱险后，于十八日抵家。途中作《曹錕烧丰都行》。

这一年，吴芳吉二十岁。他以自己坎坷的经历见闻写成《弱岁诗》十九首，大都是忧国愤世之作。他说，《弱岁诗》“尤为长兄（吴宓）所称赏，而吾志益坚矣。”吴芳吉在《弱岁诗》之一的《思故国行》一诗中，辛辣地讽刺独夫袁世凯演出“沉香雕宝座，金石镂鼓钟”的称帝丑剧，揭露袁世凯的野心是“欲令天下民，九顿三鞠躬”，“欲将天下业，子孙世不穷”。吴芳吉在同一诗中，热情赞颂蔡锷讨袁护国的义举是“顺天从民意，护国西南封”。在三年后作的《护国岩词》中，深切怀念：“滇南故都督，护国总司令，七千健儿新首领，蔡将军！”蔡锷不幸病逝，吴芳吉感叹“元恶虽天殒，贼党据重冲”。他说：“迄兹几时，曩日附逆之辈，或乃雄据中原，或且覬觐元首，盗窃鄂赣，

离间粤闽，豁然为中国主，是岂当年所能及料者耶？”（见《弱岁诗·补序》）

一九一七年夏，吴宓赴美留学，临别时，再三嘱咐吴芳吉当专力于诗，勿作他图，建议他同时研究西洋文学，以开拓眼界。吴芳吉从议，认真研习古希腊、古罗马的史诗、但丁的《神曲》及近代欧美诗人的作品，熟读了英国诗人彭斯的诗作。吴宓常选寄一些美国诗人的作品给吴芳吉，有时还将诗译成散文附在原诗后，以帮助他理解。这使吴芳吉对诗歌形式的创新有相当大的帮助。

吴芳吉的家庭经济状况一直很困窘，长期得到朋友的资助。谷醒华以“还债”为由，长期给吴芳吉家里寄钱；吕谷凡无条件为他偿还数百元旧债。吴宓在清华时，在同学好友中筹措款项，按月汇寄给吴芳吉，或赠书鼓励学习；到美国后，又得学友汤锡予、凌其峻、何墨林、黄叔巍、童季龄、瞿仲弥、沈鹏飞支持，共襄义举：待吴芳吉在经济上能自给时资助方止，“只尽在己之义，不问受者作何使用……永无酬报还答”。一九一八年秋，因美金贬值，吴宓等所得公费，仅足衣食，吴芳吉恳请不必再汇款来，但吴宓仍为购寄书刊，数年不断。

一九一九年秋，因吴宓推荐，吴芳吉去上海任《新群》杂志诗歌编辑，他的代表作，著名长诗《婉容词》在《新群》发表，接着，《护国岩词》等篇也在《新群》问世。此时，吴芳吉结交了同事曹志武，公余，同曹研习哲学和政治，尝读书至深夜。曹对哲学、政治研究较深，在曹帮助下，吴芳吉得有机会涉猎西方哲学著作，读了柯克的《政治哲学读本》和柏拉图的《语录》等著作。

就在这时，爆发了伟大的“五四”运动，接着，文学革命的

浪潮亦汹涌而来，诗歌面临变革之势。吴芳吉对这个变革是赞同的，认为“处今日之势，欲变亦变，不变亦变……非变不通，非通无以救诗亡也”。不过，他反对那种“俨若初用西文作成，然后译为本国诗者”之“新诗”，他“所理想之新诗，依然中国之人，中国之语，中国之习惯，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”。他认为那类“新诗”“突变过甚”，他不愿“随俗俱迁”，而要“自立法度”，自己开辟出一条创作途径，即“以旧文明种子，入新时代园地，不背国情，尽量欧化”（见《白屋吴生诗稿·自叙·自订年表》）。吴芳吉所要立的“法度”，就是要使诗歌既保持民族传统和风格，又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，要把外来的形式和中国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含有“洋为中用”的意思，在“五四”时代，吴芳吉就能提出这个见解，确实难得。

吴芳吉特别推崇屈原、陶潜、杜甫和丘逢甲，因为他们爱国忧民愤世疾俗，和吴芳吉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，他“所取于四子者，不仅其文，尤在其人”。他说：“所贵于文学者，非仅为学文章而已。学以养性情，学以变气质，学以安身立命，学以化民成俗者也。文，言也。言，心声也。心者，身之主也。是以文之所言，心之所思，身之所行者，必归一致，不然，徒小技耳！”在这四位古今诗人中，吴芳吉尤重台湾近代诗人丘逢甲，认为丘的“造就裨益于某诗者，自某视之，与三子同大”。丘逢甲，字仓海，一八六四年生于台湾彰化县，原籍广东蕉岭，光绪进士。甲午战败，台湾被日本侵占。丘逢甲联合台湾爱国志士，联名上书，要求“拒倭守土”，清政府不予理睬。丘逢甲满怀激愤，组织义军十四万人，坚守台中，与敌激战二十余日，屡胜。不久，清政府怯惧敌寇，诏命解散义军。丘逢甲壮志未酬，含恨退回大陆。他怀着收复台湾、誓雪国耻的壮志，在家乡开办学校，寄希

望于青年一代。他的诗多有怀念台湾之作，如《春愁》：“春愁难遣强看山，往事惊心泪欲潸。四百万人同一哭，去年今日割台湾。”

爱国忧民的思想，贯串于吴芳吉短短一生的诗歌创作中。他留下的大量诗篇，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军阀残民、民不聊生的历史画面。他的笔直刺残暴的反动统治者，他的诗句倾诉了老百姓痛不欲生的悲惨遭遇，充满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热情。他悲愤地喊道：“愿为太平犬，勿作乱世民。为犬犹有主，为民谁与亲？”他勇敢地指出残杀人民的凶手就是“茶陵谭公子，恒阳赵把都”！也就是谭延闿、赵恒惕那样的大大小小的军阀。一九二一年，他“含泪向岭头”，拜访屈原墓。他敬慕屈原之独醒，相信屈原之复生，认为屈原爱国爱民的精神乃“民族之性根”，“想见独醒精神亘古今”！

一九二一年秋七月，湘中胜地岳麓山，枫林似火。吴芳吉约刘朴、刘永济及同事数人，发起举办“红叶会”于岳麓山。席间，他们畅谈古今文苑诗坛的旧闻新事，论诗文，评作家，各抒己见，无所隐讳。酒酣耳热，赋诗联句，或引吭高歌，或颌首低吟，气氛热烈而富有诗意。

一九二二年，吴宓在南京与梅光迪、胡先骕等人创办《学衡》杂志，吴芳吉在长沙创办《湘君》杂志，他说是响应《学衡》的，但他随即指出，“两者精神虽同，旨趣各异”。《湘君》主要是刊载诗词创作，《学衡》多事理论批评。事实上，两者的精神也未必尽同。吴芳吉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就和《学衡》有分歧，他是在赞同新文化运动的前提下保留对某些问题的看法。

《湘君》筹备创刊，友人刘树海捐款百元，学生刘羨安、陈鼎芬代为经理印刷。不久，刘永济（弘度）、刘朴相继加入，遂

扩大组织为“湘君社”，公推刘永济为社长。五月五日在明德中学召开第一次社务大会，社员眷属均参加，盛况空前。自此，湘君社每年集会一次，习以为例。

一九二三年，湘君社发起建“楚辞亭”于明德校园湖中，社友辛树帜采《楚辞》中提到的草木，环植四岸，以纪念屈原，并庆祝明德建校二十五周年。

五月五日，湘君社第二次集会，刘永济手书《离骚》，徐绍周绘屈原象，影印馈赠友人及读者。九月，湘君社于岳麓山举行第二次红叶会。

一九二四年七月，吴芳吉送家眷回四川，至汉口，折返，途经南京会吴宓、柳贻徵（翼谋），八月返回长沙，完成《烟台杂诗》二十首。这二十首律诗，有的思念慈母妻儿，有的怀念友人，有的写景，有的记事。其中第十九首是船泊威海卫作以悼念海军提督丁汝昌的，诗云：“威海古雄镇，今沦异国军。丁公仰药处，野老无人闻。关塞旌旗改，营房花树曛。兴亡如可转，不用百愁纷。”抒发了诗人对国家兴亡的关切，对爱国将领的敬悼。第十二首则揭露军阀吴佩孚，为扑灭广东革命势力，招兵买马，诱人以利，把无辜百姓驱上战场的反革命嘴脸。诗中写道：

“道旁逢洛使，建节号招兵。黄金求勇士，秋令即南征。好杀原非性，完粮不用耕。长驱别寡母，半夜留啼声。”诗人以悲沉的笔触描写出老百姓的悲惨命运。

一九二五年初，吴宓离南京，就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职，他电邀吴芳吉到清华任教，不让吴芳吉再回湖南明德中学。吴芳吉以“曾被清华无理开除，不欲为仇讎效奔走”，“明德虽俸薄而精神甚安”，决意不去清华。明德中学校长亦在北京，得知此事，便一再挽留吴芳吉，要吴一道回明德。吴宓从中阻止，并

对胡校长说：“教书不似嫁人，无从一而终之义。”双方都不让步，遂成僵局。吴芳吉颇为难，他认为“胡公尊贤，长兄笃旧，情宜并从，理无偏废”。最后接受吴宓提出的折衷办法：去西安就任西北大学教职。

七月十八日离北京，二十日到郑州，遇友人贡沛成，结伴同行。至陕州，火车受阻。时内战正酣，陕军出关驱逐吴佩孚，沿铁路线数百里，兵匪纵横，行人断绝，贡沛成折返。吴芳吉冒险策驴独行，平安到达西安。

一九二六年三月，吴佩孚派刘镇华寇西安，以十师兵力围城，陕西督办李云龙师长杨忠集败兵五千人据城死守，发生长达二百三十天的围城之战。战事激烈而持久，城内百姓苦不堪言，到九月中旬，全城每天饿死者达五百人以上；吴芳吉也同西北大学师生一道遭受了这场兵灾。就在全城粮绝，人们待毙之时，闻刘镇华部某营，围屯东南城外，如每人贿以十元即可放行。西北大学同事王儒卿等商于吴芳吉，认为机不可失，决定冒险一行。师生共二十人，出南城东走，蛇行而前，来到某营所在地。有兵士从战壕跃出，按人头收钱毕，声称要等到黄昏才放行。过不久，又多次来武装官兵，将众人余钱衣物洗劫一空。众人方知上当，只好摸黑回城。路上又有数兵鸣枪追上，把大家再洗劫一通，连鞋子都脱走，只留一条内裤；吴芳吉的近视镜和腰间的皮带也不能幸免。众人踉跄而行，吴芳吉尤为狼狈，眼睛看不见，全靠学生柳潜搀扶，一手还得提着裤腰。众人好不容易才回到学校。吴芳吉写在十年前（一九一七年）《塬歌》中“宁遭贼，勿遭兵。贼来挺身御，兵来死吞声”的诗句，真是他的预言和此时遭际的写照。

在西安围城期间，适逢吴芳吉三十岁生日，他写了一首《壮

《壮岁诗》，长达三、四百句。诗前小序云：“时方困长安围〔危〕城，生死难料。趁此苟安，感而赋此。天命未终，应获无恙，倘有不讳，此为最后一息。”诗句描绘了“饿殍满街蒸疫疠”，“野犬食人肉”的惨景。

围城待毙时，吴芳吉与学生柳潜相约，俟垂毙之时，即整肃衣冠，于礼堂端正，从容而死。解围后，柳潜因久饿骤食暴死。吴芳吉作《哭柳潜》三首悼之。诗篇盛赞柳潜的品德和诗风，《白屋吴生诗稿·附注》中说，梁启超曾致书吴宓：“壮岁诗瑜不掩瑕，哭柳潜三首纯乎其纯，将来必为诗坛辟新世界，请得介绍而友之也。”时正值吴芳吉返里奔丧，没有作出表示。不久，梁启超谢世，吴芳吉甚为遗憾，责备自己说：“而某不长进，亦永无以副先生望耶”！

是年十二月，吴宓自北京去西安探视吴芳吉，并约他同赴北京。次年（一九二七年）正月离西安，因战乱，陇海线被阻，遂渡黄河，取道山西，正月下旬始抵北京。不久，即去沈阳东北大学访刘朴和刘永济，为校方留聘。任教两月，闻父病重，即取道大连、上海急返四川，于六月二十三日晨抵重庆，距家仅一百四十里，本可当天到家，不料重庆驻军刘湘部，说他坐的这只船从汉口开来，船上必有共党，乃上船搜查，拿走吴芳吉诗稿一卷（笔者按：吴芳吉在西安围城期间，作诗颇多，曾辑有《围城小集》一卷，后遗失，这里被搜去的有可能就是这本集子）。

六月二十四日薄暮，吴芳吉返抵德感坝，孰料父亲已先一日去世。丧葬毕，决定不再去东北大学。吴宓函约去北京，一面教书，一面研究西洋文学。吴芳吉婉辞。旋接受成都大学校长张澜邀请，于九月中旬赴蓉任成都大学教职。教学“颇得学生信仰”，争着要他授课。据当年理预科学生、现成都科技大学教授、年逾

七旬的李文龙同志说：“我印象最深的一点，是芳吉先生海人不倦的精神与和蔼可亲的态度。他除了规定的作业认真批改以外，凡是同学课外做的诗文，只要向他请教，他都耐心指点，从不厌倦。”

一九二八年七月，吴芳吉任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。他将历年诗作辑为《白屋吴生诗稿》出版，在“编辑大意”中告诉我们：

“江津聚奎小学，为某儿时肄业之地，山川之胜，甲于全蜀学校。某之诗趣，得诱启最多，兹以母校二十五周年纪念，作为聚奎小学丛刊之一。”

一九三一年，旧友谷醒华任江津县长，邓禧仙任江津县教育局局长，函请吴芳吉回县立中学主持校务，整饬校风。他就任之后，一反该校过去的惩办主义和高压政策，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，耐心劝导，视学生如己之子女。校中学习之风大长，学生黎明即起，书声琅琅，犯错误者、游手好闲者日少。吴芳吉还制订出一套办法，诱导学生走上正路。他摘录古人的嘉言懿行，周末在礼堂为学生讲述；又定每周星期三为“家书日”，每个学生在这天必须给家里写信，汇报自己一星期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。他还亲率全校学生到西门外开辟大操场，同学生一起劳动。就在这一学期，还举办过一次全校性的运动会。学校经过他的整顿和革新，一扫散漫风气，呈现朝气蓬勃的景象。

九月，震惊中外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暴发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，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。吴芳吉义愤填膺，深夜集合全校师生，作揭露日军暴行的讲演，声泪俱下，哽咽不能成声。他还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诗歌，唤起民众，抵制日货。街头上满贴着“仇货买不得，买了仇货污人格”的抗日标语。

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军进袭淞沪，十九路军在上海